

责任编辑 余 涉
封面设计 梁 珊

鲁迅纵横观 [苏] 谢曼诺夫著 王富仁译
吴三元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54000 印数0001—24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045-6/I·44

统一书号: 10317·411 定 价: 1.60 元

出版者的话

鲁迅，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

鲁迅逝世后的五十年来，许多国家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对鲁迅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涌现了不少有影响的论著，有的国家（如日本）还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流派。近二十年，国外对鲁迅研究又有了很大的进展。研究的重点从一般地复述、评介鲁迅的思想、业绩和著作，转移到把鲁迅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革命家和艺术大师来剖析和探索。在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上出现了令人注目的变化。

为了使我国的鲁迅研究者，打开眼界，扩展思路，了解国外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以提高自己的鲁迅研究水平，我们特出版这套国外鲁迅研究资料丛书，拟在几年内有计划地陆续译介一批国外的鲁迅研究的论著，提供人们参考。

在选目中，这套丛书尽量兼顾不同观点、不同方法，特别对国外各种研究流派中有代表性的论著，更予以优先介绍。对被译介的论著中的有些观点和方法，我们并不同意，但是考虑到保持原论著的本来面貌，除了个别特殊情况外，我们一般不作删节。

本丛书请鲁迅研究界老前辈黄源、戈宝权同志主编，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我们期望鲁迅研究者和广大读者能为这套丛书推荐书目，并给予批评、指正。

目 录

1 致中国读者 弗·伊·谢曼诺夫

4 弗·伊·谢曼诺夫和他的鲁迅研究

王富仁

23 鲁迅及其先驱者

176 鲁迅与教条主义者

193 美国汉学中的鲁迅

207 有关鲁迅的两本书

219 评拉斯特的《鲁迅—诗人和偶像》

226 译后记

致中国读者

弗·伊·谢曼诺夫

非常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能为我出版这个鲁迅研究论文集，并给我提供了一个向中国读者说话的机会。我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翻译和教学工作已经三十多年了，我很热爱自己的这个工作。鲁迅是我最感兴趣的作家之一，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谈论自己总是不太合适，所以我只介绍一下我的实际情况。在五十年代初，我便对鲁迅发生了兴趣，这种兴趣的加强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我作为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进修，同时还在北京大学听课，搜集关于晚清文学的资料。这种资料当时很少，即使现在也仍然不多。在这个过程中，我很快便明白了，离开鲁迅，离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离开他的大量有关论述和他的文艺创作，要深刻理解晚清文学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便产生了我的学位论文《十九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和鲁迅》，并于一九六二年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后来（1967

年)，我将它改写成了《鲁迅及其先驱者》一书，对于这部书，你们已经注意到了。

《鲁迅及其先驱者》于一九八〇年译为英文，在纽约出版，并被广泛引用。鲁迅和他的先驱者的关系的问题相当重要，不进行详尽的比较，便无法了解这个伟大作家的巨大革新，也无法了解他与传统的多方面的复杂联系。

在《鲁迅及其先驱者》里，我主要论述了鲁迅与其直接先驱者们的关系，至于他与更遥远的先驱者们的关系，我则在《鲁迅与民族遗产》（收入论文集《民族遗产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起源》，莫斯科1965年版）里做了论述。这篇文章是我与苏联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И·С·李谢维奇合写的。考察鲁迅及其研究者的关系当然也是必要的，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我在论文《鲁迅与教条主义者》（载《亚非民族》杂志1968年第2期）有所涉及，现在将它收入了这个论文集。

重读我的这些鲁迅研究作品，我发现它们主要围绕着两个论题，一是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二是他与世界文学的联系。有关第一个论题的有《新的经典作品》（载《文学问题》杂志1962年第8期，中文译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3期）、《关于东方文学的“近代时期”的问题》（载《亚非民族》杂志1962年第2期）、《评索罗金的〈鲁迅世界观的形成〉》（载《东方学问题》杂志1959年第6期）。《鲁迅论外国文学》（载《亚非民族》杂志1965年第5期）是论述第二个论题的，该文曾于一九六九年译为英文，收入论文集《苏联的亚洲问题研究》。除此之外，部分涉及这个论题的还有《伟大的中国作家》（载《外

国文学》杂志1961年第9期)、《鲁迅的佚文》(《东方文学作品选》第6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鲁迅作品的新译》(载《外国文学》杂志1966年第10期)、《“迅行”》(载1981年9月23日《文学报》)、《中国作家反对法西斯主义》(载《外国当代文艺》杂志1985年第3期)。

我的作品中还有一组是有关外国鲁迅研究的文章,其中有《鲁迅作品的特点及世界的“鲁迅学”》(新加坡1977年中文版)、《两本论鲁迅的书》(载《亚非民族》杂志1961年第5期)、《评拉斯特的〈鲁迅——诗人和偶像〉》(载《亚非民族》杂志1962年第4期)、《评波兹德涅耶娃〈鲁迅〉一书的日文译本》(载《亚非民族》杂志1973年第6期)、《美国汉学中的鲁迅》(载《远东问题》杂志1982年第3期)。

不言而喻,收入本书的并非我的全部的鲁迅研究论文,而仅仅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就这样,我们编成了这本书,并名之曰《鲁迅纵横观》。对于该书能在伟大的鲁迅的祖国出版,并且恰在我再次来华亲眼看到加强我们两国关系的极端必要性的时候,我是极感荣幸的。我想,一个外国人对鲁迅的看法,你们定会感到兴趣吧!

一九八七年二月三日于北京大学勺园

弗·伊·谢曼诺夫和他的鲁迅研究

王富仁

对于我国鲁迅研究界，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界，弗·伊·谢曼诺夫已经不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了。《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鲁迅研究动态》、《鲁迅研究年刊》、《芙蓉》、《啄木鸟》等文学或文学研究杂志，都曾译载过他的研究文章或发表过介绍他的研究成果的文字，他的作品还曾译载在像《国外鲁迅研究论文集》这样的书籍中，在中国鲁迅研究工作者的著作或论文里，他的作品也曾不止一次地被引用过。

弗·伊·谢曼诺夫于一九三三年生于列宁格勒，一九五五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远东语言文学系汉语专业，同年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当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来我国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回国后任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三年担任该所亚非文学组组长，一九七三年始任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至今。

像多数外国汉学家一样，弗·伊·谢曼诺夫的研究范围并不局限在中国文学的某一个历史时期，在他迄今出版的四

本书和一百余篇研究论文之中，几乎涉及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各个历史时期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他出版的四本书是：

《鲁迅及其先驱者》莫斯科1967年版

《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莫斯科1970年版

《慈禧太后掠影》莫斯科1976、1977年版

《鲁迅作品的特点及世界鲁迅学》新加坡1977年中文版

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有：《艾芜短篇小说集》、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老舍的《猫城记》、《赵子曰》和《牛天赐传》、陈森的《稀有作家庄重别传》、古华的《芙蓉镇》，此外，他还与B·A·斯米尔诺夫和M·E·施乃德合译了吴强的《红日》。

他的大量研究文章我们不能一一列举了，不过，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具有特色的文章篇名，可以说，像这类论题，很多是中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应作、可作而未作或忽略了作的题目。如：《东方文学中的‘近代时期’问题》、《论“世界文学史”结构的不同方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小说理论》、《中国的侠义小说（十四至十六世纪）及其对中国新文学形成的作用》、《文学联系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发展的作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外国文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日本小说》、《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中国小说中外国题材的出现》、《十九世纪中国惊险小说的特性》、《东方文学的

区域问题》、《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来阐释东方文学的问题》、《中国的启蒙文学问题》、《论中国长篇小说里的“游记”体裁》、《论考察亚非文学中使用共同原则的可能性》、《中国长篇小说的演变》、《曾朴的创作和中国文学里艺术方法的形成》、《论东方的浪漫主义问题》、《中国文学中的欧化方法溯源》、《论二十世纪的中国诗歌》、《中国古典长中篇小说的蒙文译本》、《中国诗人心目中的日本风光》、《中国短篇小说的产生》……对于这些题目，弗·伊·谢曼诺夫未必都已经做得很充分，但说明他的思维空间是比较开阔的，而这种思维空间的开阔性和思维的灵活性，往往是一个研究者能否找到发挥自己研究才能的最有利的课题的前提条件。我认为，弗·伊·谢曼诺夫的成功与此是息息相关的。

弗·伊·谢曼诺夫的研究视野非常广阔，但其中还是有脉络可寻的。我认为，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他的兴趣似乎主要集中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中，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及其作品的翻译、鲁迅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似乎是他的汉学研究的三个重心；在研究方法上，他显然特别重视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纵向历史流程和中国近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横向世界联系，并且特别重视在纵、横这两种文学联系中把握中国文学的独特性。这样，比较研究，包括纵向的历史比较、横向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便成了他主要的研究方法。

国外的鲁迅研究，至少从现有状况而言，最为繁荣且成果卓著者，当然要首推日本，但其次大概就要是苏联了。从我们最早熟知的《阿Q正传》俄文译者瓦西里耶夫(王希礼)

到费德林、罗果夫、艾德林、索罗金、波兹德涅耶娃、彼得洛夫等许多苏联学者，在鲁迅作品的翻译、介绍、研究上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弗·伊·谢曼诺夫之能够在这许多苏联鲁迅研究学者中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并赢得了广泛的世界声誉，是与他的《鲁迅及其先驱者》一书分不开的。该书于一九六七年出版之后，立即受到了苏联汉学家的重视，艾德林担任了该书的编辑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它是第一个研究这个专门课题的著作，是以对有关作品的“不辞劳苦的分析”为基础的，翌年另一位著名苏联汉学家索罗金也在《亚非民族》上发表书评，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九八〇年，美国学者查尔斯·艾勃将该书译为英文，一部苏联的鲁迅研究著作，在尚未出版中文译本之前，早已被译为另一种外国文字，固然说明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我国鲁迅研究工作受到的损害，同时也足以证明该书的价值和意义。做为一个中国的鲁迅作品的初学者，我是在一九七九年初读此书的，它对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十分明显，这种影响也波及到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在这两本书中，我都引用过它的论述。但这并不说明，我对弗·伊·谢曼诺夫这部著作没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下面，我主要就这部著作，谈一谈弗·伊·谢曼诺夫的鲁迅研究，并以个人的身分，提出一些与之商榷的意见。

《鲁迅及其先驱者》一书的写作，实际应从弗·伊·谢曼诺夫首次来华进修（1957年3月到1958年4月）算起，他当时的目的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正像他为本书写的《作者的话》中所说：“离开鲁迅，离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离开他的大量有关论述和文艺创作，要深刻理解晚清文学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他便首先从观念上，从整体的认识上，把中国近代文学同鲁迅联系在了一起，并且不仅仅是在时间先后继起的意义上，而是在文学历史连续流动的意义上，亦即在二者的本质联系的意义上，把两个彼此独立存在的文学现象纳入了自己的一个统一的思想框架。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弗·伊·谢曼诺夫不仅注意到了鲁迅对晚清文学的评论文字，更注意到了他的文艺创作。这也就是说，他同时在中国近代文学中看到了鲁迅的模模糊糊的面影，也在鲁迅身上发现了中国近代文学的不甚分明的面影，在他的思维形式中，二者再也不是彼此绝对分离的东西，而成了一个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统一体。我认为，这就是比较思维的开始，也是比较文学产生的前提条件。换言之，比较文学首先产生于由研究者的思维活动，通过纵向的或横向的、外部的或内部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联系，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在暂时排除了它们之间客观存在的时空距离之后，重新组织在一个统一的思想框架中的时候。在这里，某种性质的联系是重要的，因为只有有了这种联系，研究者才能在特定的思维程序中由一个联想到另一个，或由这种特定联系而同时联想到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并将其在思维活动中组织在一起，使它们取得了可比性。但是，任何两个事物间的联系都是无限复杂的，有着多种层面、多种侧面的多种联系，而研究者，却只能意识到并利用其中一种或几种联系，而这种联系，不论其在重点比较“同”或重点比较“异”的比较文学研究中，都内在地制约着研究者的比较空间和比较方向。我

认为，了解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部比较文学论著能够在哪些方面做出自己的独立贡献，又在哪些方面不可能不具有自己的局限性。

在晚清文学与鲁迅之间，弗·伊·谢曼诺夫赖以将它们组合起来的主要联系是什么呢？显而易见，是彼此连续的历史流程 and 没有间断的时间链条。在中国文学自身的流动中，是由于晚清文学的流动涌现出了鲁迅的作品，而鲁迅作品则是晚清文学历史发展的结果，它们在时间上前后相接，并没有一个断裂层，就鲁迅的一生和晚清文学的存在全过程而言，二者既相叠合又有交错。这样，晚清文学和鲁迅便被组织在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一个纵向流动的统一时间流之中了。在这个时间流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是孕育它的文学子宫，后者则是前者的产物，它从孕育它的文学子宫中产生出来，取得了自己的独立性，但它到底曾经在这样一个子宫中被孕育过，不能不带有孕育过它的事物的一些特征。我们必须认为，弗·伊·谢曼诺夫发现的这种历史联系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可靠的，这决定了他选择的这个论题的基本意义和主要价值。他从中国回国之后，即写了题为《十九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与鲁迅》的硕士学位论文，并于一九六二年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此后，他又在这个论题上做了大量工作，写成了《鲁迅及其先驱者》一书。不论就其广度和深度，前者当然不能与后者相比，但有一点则是贯穿始终的，即他赖以进行比较的基础，仍是上述的历史联系。

《鲁迅及其先驱者》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在于，在此之前，包括中国的鲁迅研究工作者在内，还从来没有如此细

致、如此全面地论述过鲁迅与晚清文学的文学联系。我们不能不承认弗·伊·谢曼诺夫以论战性的语调对此前的鲁迅研究，其中主要是中国的鲁迅研究界提出的尖锐批评。他指出到他之前，人们对这样一个论题是不重视的，有限的一些关于鲁迅与晚清思想家、文学家的关系的文章都带有浮面的、粗糙的性质，甚至对我国文学界的泰斗郭沫若的《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也做了毫不容情的指责，认为他选取了一个基本没有价值的角度，进行的是一些浮面的事实类比……在下文，我还要为中国鲁迅研究界做有限的辩解，但在此之前，我们还应承认弗·伊·谢曼诺夫确实不无道理地批评了忽视鲁迅与晚清文学历史联系的研究状况。那末，在我们各自努力发掘着鲁迅研究的各种潜能的时候，为什么对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论题没有引起我们更大的注意力呢？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鲁迅研究工作者对晚清文学的了解更少，对晚清文学与鲁迅先后继起的历史事实没有明确的认识，而在于内在的意识障碍。我们知道，从二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是我国逐渐发展着把对立斗争绝对化的社会思潮的历史时期，对立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对立的双方和斗争的诸方还有没有一致性的联系？“一分为二”之后的“二”是不是已经断绝了一切关系？还有没有共同的特征？这种根本的哲学问题，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研究。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的应当是，越是直接对立的東西，越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越是有着赖以存在在一个统一体中的不能没有的一致性特征。当新的事物通过否定旧事物的方式从旧事物中诞生出来之后，绝非抛弃了旧事物的一切特质，而只是改变了它的主要性质。做为革新家的鲁迅，分

明是在对他的直接先驱者的反叛中站立起来的，没有这种反叛便没有新文学，便没有鲁迅的独立文学地位，但这种反叛不是简单抛弃，不是在任何方面的绝对对立，所以二者之间的联系依然是深刻的、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并不比鲁迅与同为反封建文学作家薄伽丘、拉伯雷或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巴比塞，阿拉贡等人的联系来得松散。显而易见，在同即是同、即是全同，异即是异、即是全异的观念下，是不可能有什么比较文学的，是不可能有什么稍为细致、深入的比较研究的。我认为，这应是我们忽略了弗·伊·谢曼诺夫所注重的这一比较研究论题的根本原因；而当时与世隔绝的封闭状况，对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状况的隔膜，因此造成的比较观念的薄弱，尚是次要的原因之一；对于弗·伊·谢曼诺夫在《鲁迅及其先驱者》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有他的原书在，我们就不一一评述了。每一个读者都会看到，他在这方面做的细致而刻苦的分析，尽管我们未必全都赞同，但其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它填补了鲁迅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至少在该书之前，没有任何论著把鲁迅与晚清文学的联系论证得如此充分。

我们说《鲁迅及其先驱者》一书的主要功绩在于揭示了鲁迅与晚清文学的历史联系，并非说弗·伊·谢曼诺夫没有注重鲁迅的独立创造，恰恰相反，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了这方面的内容。在不少方面，这一章是很有特色的，提出了很多此前我们较少注意到的问题。在这里，我想附带说明比较文学中的另一个问题，即异同比较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比较研究中，不论我们注重于同，还是注重于异（这是与作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及具体写作目的有关的），二者都总是同时并进的。不论只见其同不见其异，还是只见其异不

见其同的情况都是不存在的，我们越是更多、更细致地感受到二者的联系，也便越是更多、更细致地感受到二者的区别。反之依然。弗·伊·谢曼诺夫当细致地考察了鲁迅与晚清文学的历史联系之后，才能更真切地发现鲁迅与它的不同，发现了他的独立意义和价值。

该书的具体优点还有很多，例如注重形式的研究，注重具体作品的分析，注重译文与原文的比较，严格的学术论辩态度等等，在此我们不可能一一谈到。

当我们充分研究了弗·伊·谢曼诺夫的比较视角的合理性之后，我们不妨再看一看它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弗·伊·谢曼诺夫是通过历史联系把清末文学与鲁迅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联系中，鲁迅是清末民初文学发展的自然结果。我们曾经指出，这种联系是真实的、合理的，但是它的真实程度和合理程度到底达到了多大高度呢？是否是绝对的真实、绝对的合理呢？我认为，历史从一个方面而言，就其客观存在而言，是纵向流动的一股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到了一个作家面前，到了一个人的观念中，历史则常常不仅仅是纵向发展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横向陈列的平面。人的历史，不像一棵树的生长。对于一棵树，一个枝条只能从分出它的干上伸展出来，原有的种子和树根只是它的远因，而不能构成它的直接原因。而对于一个作家，他此前的全部历史能够同时展现在他的面前，他能够更主动、更自由地进行自我选择。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呐喊》、老舍的《骆驼祥子》、柳青的《创业史》，姚雪垠的《李自成》，从时间顺序而言，是纵向历史过程中的几个点，但一个当代作家从自己的书架上取下哪部或哪几

部去读，则是不受时间顺序的制约的。也就是说，在一个作家面前，“直接先驱”的概念是不清晰的、模糊的，能不能说刘心武的直接先驱是文革中的革命样板戏、革命样板戏的直接先驱是梅兰芳、马连良呢？似乎不能这样说。鲁迅与清末民初的文学关系没有这么单纯，但我们在把握二者的关系时却必须考虑进这种复杂的因素。

再者，文学的历史是发展的、前进的，但这必须仅仅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来把握，即任何历史已有的作品，都不能代替后代的独立创造，从原则上，后人应该有更大的可能性创造出前代人所不可能创造出的更高的艺术成就，把文学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但是，这种文学的进化发展观，绝对不能用另外一种相似的观念来代替，绝对不能认为任何一个后代的文学现象都会比前一代的文学现象具有更高的文学成就，更不能认为任何一个后代的作家都比前一代作家更先进，成就更高。

严格说来，以上两个问题，弗·伊·谢曼诺夫还是有所注意的，他的严格的科学态度也相对抑制了它们的片面发展，但必须看到，甚至在他建立自己的比较研究的观念的时候，这两个问题已经内在地约束着他了。它们不能不在他的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其中以全书第二章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不止一次地批评鲁迅对晚清文学的评价并不公正，尽管其中也有他所说的主客观原因，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自己失去了对晚清文学的正确把握。他说：

鲁迅不会看不到，就题材的多样性，就批判的尖锐性，谴责小说都超过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但

其间已隔了一个半世纪，鲁迅理应对谴责小说提出比对《儒林外史》更高的要求。

每一个中国读者都会感到，这里的问题根本不是鲁迅对谴责小说提出了比对《红楼梦》、《儒林外史》更高的要求的问题，而是它们根本没有达到《红楼梦》、《儒林外史》的思想艺术水平的问题，是它们在“题材的多样性”和“批判的尖锐性”上远远不及《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问题。鲁迅说自从《红楼梦》出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个评价，不仅指《红楼梦》与以前的文学的关系，而是说它与整个传统文学的关系，所以他说它“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同上）。而晚清谴责小说，则远不能说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不论其思想性还是其艺术性，都远远不能与《红楼梦》相比。我认为，主要因为这种思想艺术把握标准的差异，产生了弗·伊·谢曼诺夫对晚清文学具体评价上的差异，这使弗·伊·谢曼诺夫在很多方面，再也无法深入到鲁迅论述的更深层本质中去，无法再在更本质的关系中理解它们的合理性。弗·伊·谢曼诺夫所说的限制鲁迅对晚清文学做出更高、更全面的评价的主客观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鲁迅的评价中就必然具有非科学的性质。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下面一个例证，弗·伊·谢曼诺夫写道：

鲁迅绝对不是否定吴沃尧和李宝嘉对社会的批判，
但他对谴责小说创作方法的严厉态度，却造成了对鲁迅